

构建适配先进装备制造业集群的现代金融体系

□ 项逸皓

当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先进装备制造业作为制造强国战略的核心支柱,其集群化发展水平直接关系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区域协调发展成效与高质量发展质效。然而,现有金融支持体系与先进装备制造业集群演进的内在逻辑之间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结构性错配,制约了产业能级提升与“蝶变”进程。立足新发展阶段,亟需以系统性思维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覆盖集群全生命周期、贯通多层次资本市场、强化政银企协同的现代金融支持体系。

金融支持与集群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结构性错配

区域金融资源配置呈现非均衡特征。先进装备制造业集群高度集聚于长三角、珠三角及京津冀等东部沿海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及中小城市配套企业仍面临融资渠道狭窄、信贷可得性偏低、风险定价机制缺失等约束。“中心—外围”格局制约了优质中小企业嵌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链,削弱跨区域协同效能。

融资结构存在期限错配,“耐心资本”供给不足。装备制造企业具有重资产、长研发周期、高技术门槛和高不确定性特征,亟需中长期资金支持。但大量中长期“专精特新”企业仍依赖短期流动贷款,陷入“短贷长用”困境,股权融资覆盖面有限,难以支撑核心技术攻关与产品迭代。

“文化+生态”双轮驱动

□ 张 军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涵盖了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多个维度的全面振兴。文化建设是乡村的“精神脊梁”,能涵养乡风文明、留存地域记忆;生态文明建设是乡村的“生存根基”,可守护绿水青山、筑牢发展底线。二者的深度协同,既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更是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如今已在实践中展现积极态势,打下良好基础。

文化建设与生态文明协同发展的基础与有利条件

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文化建设与生态文明协同发展已积累坚实基础,从多维度形成了助力深化协同的有利条件。

从资源禀赋看,我国不少乡村兼具一定的生态资源与地域文化特色,二者天然共生。例如,皖南古村依山水而存,既含粉墙黛瓦建筑文化,又拥山环水绕生态美景,西南少数民族村寨更将非遗技艺与森林、梯田生态深度绑定,为协同发展提供天然纽带。

从实践探索看,多地已涌现典型案例,浙江安吉以生态修复为契机同步活化竹文化、陕西礼泉袁家村通过村落风貌修复与生态管控打造“民俗+生态”模式,证明协同发展可产生“1+1>2”的效益,积累

□ 刘水纯 杨明莉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部署,为新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数字营商环境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和制度服务,将数字技术全方位、系统性嵌入政务服务、市场监管、要素配置等营商环境各环节,通过技术基座、制度保障、要素配置、生态培育等多维度耦合联动,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活数据要素价值、赋能产业数字化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为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制度保障与生态支撑。

筑牢数字技术基座,夯实创新的物质基础。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科技创新,而高性能算力、高速网络、专业化平台等数字基础设施是技术创新的前提条件,数字营商环境通过统筹推进新型数字基建布局,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筑牢物质根基。一方面,通过集中建设算力枢纽、工业互联网骨干节点等基础设施,降

低企业单独搭建技术平台的成本,尤其为中小微企业减轻创新投入压力。另一方面,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技术专利、科研设备、实验数据等创新资源在线共享,打破创新主体间的资源壁垒,加速跨领域、跨主体协同创新与技术迭代。这种“硬件共建、资源共享”的数字技术基座,让创新要素更易流动、创新成本大幅降低,为新质生产力的技术突破提供坚实的基础保障。

构建包容审慎制度环境,对冲创新的不确定性。新质生产力具有颠覆性、探索性特征,创新过程中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亟需稳定透明、包容审慎的制度环境保驾护航,数字营商环境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赋能相结合,构建起“放管结合、激励相容”的制度体系,有效对冲创新风险。在“放”的层面,通过“一网通办”等数字治理改革,打破部门壁垒和数据孤岛,推动政务服务流程重构。在“管”的层面,推行“监管沙盒”“柔性监管”等新型监管模式,为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创新设置安全测试空间。这种放管结

以“蝶变周期”为导向构建适配型金融支持体系

借鉴国内外经验,先进装备制造业集群通常经历三个阶段:形成期以主导企业或重大项目集聚为标志,创新基础薄弱,亟需技术引进与产学研协同;成长期企业快速成长、创新活跃,但治理与融资机制滞后,需强化成果转化激励;成熟期产业集聚度高、生态成熟,应链接全球创新网络,突破路径依赖,迈向世界级能级。金融支持必须紧扣这一演进规律,实施分阶段、差异化、精准化的制度供给与服务创新。

了可复制经验。

从主体参与来看,村民对“文化护根、生态护家”的认知不断深化,自发组建非遗传承队、生态管护队,返乡青年更带回新理念推动“生态农场+文化研学”等项目,形成“人人想参与、人人能出力”的内生动力。

从政策支持看,国家层面相关规划文件已明确提出推动乡村文化与生态协同发展的导向,地方层面也有不少地区结合实际出台配套措施,如设立专项支持资金、制定特色发展标准等,并尝试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为协同发展筑牢外部支撑。

文化建设与生态文明协同发展模式的构建

“生态+文化旅游”模式。充分利用乡村的自然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开发以生态观光、文化体验为核心的乡村旅游产品。例如,打造生态文化旅游村落,将传统民居的修缮与生态景观建设相结合,同时开展民俗文化表演、传统手工艺制作体验等活动,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旅游。通过这种模式,既能让游客欣赏美丽的自然风光,又能深入了解乡村的文化内涵,实现生态与文化的有机融合,促进乡村经济发展。

“文化+生态农业”模式。在生态农业发展过程中融入文化元素,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一方面,挖掘农业产品的历史文化渊源,打造具有文化特色的农产品品牌。另一方面,开展农业文化体验活动,如农事节庆、农耕文化展览等举措,让游客亲身参与农业生产过程,感受农耕文化的魅力,拓展生态农业的发展空间。

优化金融空间布局,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可统筹金融与产业政策资源,设立先进装备制造业协调发展专项基金,重点支持中西部配套企业数字化与智能化升级。鼓励地方法人银行在产业集群次中心城市设立科技金融专营机构,实施差异化利率与监管安排。同步建设“全国装备制造业集群金融地图”大数据平台,整合工商、税务、电力、征信等多源数据,构建企业信用画像与融资需求图谱,动态识别融资缺口,提升跨区域资源配置与风险预警能力。

构建“股债贷担保”五位一体多元化融资体系。针对装备制造业“长周期、高风险、高回报”特征,亟需突破单一信贷依赖。一是强化多层次资本市场衔接,支持企业通过区域性股权市场和新三板梯次培育登陆北交所,配套挂牌激励。二是探索设立国家级科创母基金,联合社会资本投向成长期高的企业,提供5年~10年“耐心资本”。三是深化“首台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信贷”联动机制,对保费给予合理比例支持,推动金融机构将保单作为增信依据,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提升授信额度。

推行“全生命周期”金融产品创新。在形成期,推广“技术引进+政府增信”模式,由园区设立合理比例风险补偿资金,支持发放“技术并购贷”或“设备更新贷”。在成长期,试点“知识产权质押+未来收益权质押”组合融资,允许科研团队以成果转化预期收益作为还款来源。在成熟期,支持链主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或

“生态文化+乡村治理”模式。

将生态文化理念融入乡村治理体系,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通过制定体现生态文化价值的村规民约,引导村民自觉遵守生态环保规定,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同时,利用如乡村文化活动中心、文化广场等文化建设的成果,作为宣传生态文化和开展乡村治理工作的平台,增强村民的参与意识和自治能力,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文化传承+生态修复”模式。在生态修复工作中注重对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对于一些因生态破坏而受损的文化遗址、传统村落等,在进行生态修复的同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护和修复其文化价值。例如,在对某古村落周边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时,保留和修缮了古村落中的传统建筑,挖掘和整理相关的历史文化资料,使古村落既恢复生机,又传承文化。

文化建设与生态文明协同发展模式的实施路径

加强资源整合与规划。政府应组织相关部门对乡村的文化和生态资源进行全面普查和评估,建立资源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制定科学合理的协同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步骤。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打破条块分割,实现文化资源与生态资源的有机整合,为协同模式的实施提供有力的规划保障。

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加大对文化建设与生态文明协同发展的支持力度。在财政政策方面,设立专项扶持资金,用于乡村文化设施建设、

合的制度设计,解除了创新创业者的制度顾虑,为新质生产力孕育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制度土壤。

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畅通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循环。新质生产力发展离不开数据、人才、资本等核心要素的高效配置,而数字营商环境正是打破要素流动壁垒、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抓手。通过建立数据产权界定、流通交易、收益分配等基础制度,推动“数据资源”向“数据资产”转化,激活数据要素价值;依托数字平台打破地域分割,搭建跨区域人才供需对接机制,实现高端科技人才、技能人才的精准匹配,优化人才配置效率;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普惠金融,构建企业数字画像,实现金融资源与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精准匹配,确保核心要素向高效率创新领域顺畅流动,破解融资难题,提升要素配置效率,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核心动能。

培育融通协同的创新生态,强化新质生产力产业化合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并非只是技术的突破,而是技术簇群产业化的过程,需要产学研用各方协同发力,

运用跨境人民币工具,募集资金用于全球研发中心与智能制造基地建设。

健全集群促进组织,畅通金融对接机制。可依托现有产业协作平台,探索设立专业化、市场化运作的集群促进机构,作为独立第三方,聚焦项目筛选、融资撮合、风险评估与政策传导。常态化组织银企对接、投融资路演,动态发布经第三方评估的优质企业信用推荐清单。鼓励探索“促进机构+担保机构+银行”三方风险共担模式,对纳入国家或省级集群重点项目的企业,推动担保费率合理降低,切实减轻综合融资负担。

金融赋能并非简单的“输血式”资金投入,而是通过制度创新、产品适配与机制协同,推动金融体系与先进装备制造业集群实现深度耦合与协同发展。面向以技术密集、数字驱动、绿色低碳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亟需以产业集群演进规律为纲,以全生命周期服务为目,构建覆盖企业成长各阶段、匹配创新长周期、降低融资成本、提升配置效率的现代金融支持体系。唯有如此,才能有效打通从“制造”到“智造”、从“国内集群”到“世界级集群”的跃升通道,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坚实支撑。

【作者系辽宁对外经贸学院经济学院讲师;本文系2024年度辽宁省教育厅高校基本科研项目《“数智金融”赋能辽宁省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编号:LJ112410841011)成果】

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生态保护项目、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等项目。在土地政策方面,优先保障文化建设与生态建设项目的用地需求。在税收政策方面,对从事生态文化产业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

强化人才培养与引进。一方面,加强对乡村居民的培训,通过举办各类培训班、讲座等形式,提高居民的文化素质和生态环保意识,培养他们参与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能力。另一方面,加大对专业人才的引进力度,制定优惠政策,吸引文化、旅游、生态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到乡村创业就业。同时,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与乡村开展合作,为乡村提供智力支持和技术服务。

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各种媒体渠道,广泛宣传文化建设与生态文明协同发展的重要意义和成功经验,提高社会各界的关注度和认同感。通过举办各类文化活动、生态环保主题宣传活动等形式,引导乡村居民积极参与,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乡村振兴的良好氛围。

文化建设与生态文明的协同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重要任务。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协同模式,加强资源整合、政策支持、人才培养和宣传引导等实施路径,能够有效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实现乡村文化、生态的良性互动,推动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在未来的乡村全面振兴实践中,应进一步深化对文化建设与生态文明协同发展的认识,不断探索创新协同模式和实施路径,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单位:中共山东荣成市委党校)

以数字营商环境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数字营商环境通过搭建数字化协同平台,打破组织边界,构建融通协同的创新生态,为新质生产力孕育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制度土壤。一方面,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通过开源平台、产业联盟等数字化载体,促进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与企业生产需求精准对接。另一方面,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格局,引导龙头企业通过数字平台开放技术、场景资源,带动中小微企业融入创新生态。同时,透明的数字市场环境和丰富的行业数据,帮助企业精准识别市场需求和创新机会,优化投资布局,将更多资源集中于核心技术研发和产品迭代,加速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化进程。

推进营商环境数字化,必须超越技术工具视角,从生产关系适配生产力发展的高度,坚持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双轮驱动,将数字营商环境的潜在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现实优势,方能为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不竭动力。

(作者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党校校)

□ 刘 也

近年来,课程思政成为新时期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课程改革的核心议题。作为课程体系的关键一环,体育教育的价值远不止于增强体质、传授技能。其本身蕴含着塑造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品质、厚植家国情怀的独特力量。“体育思政”理念的提出,正是对这一育人功能的深刻回归与时代升华,其核心要求是在体育教学的全过程中,将价值引领无缝融入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然而,从宏大理念到实践落地,二者的融合并非简单的物理相加,而是一场深刻的教学范式变革。

高校体育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实践中存在的现实偏差

融合意识淡薄导致体育教学的育人功能被边缘化。在长期教育实践中,工具主义的认知偏差根深蒂固。部分管理者与体育教师,仍将体育课的价值窄化为增强体质、达成技能指标的工具。这种重“技”轻“德”的认知,使其未能真正树立起体育承载思政功能的自觉。在这种认知下,体育教师的角色被自我矮化为技能教练而非育人导师,教学重心完全倾斜于动作要领传授与身体素质训练。更有甚者,将思政教育看作是思政课教师的专属职责,认为与体育教学毫无关联。在这种意识缺位下,体育固有的德育、美育、劳育等多维功能被人割裂,课程巨大的育人潜力被长期闲置。即便有上级政策要求推进融合,实践中也多流于形式,未能从根本上扭转体育教学的价值取向,最终造成体育思政融合的实践根基始终薄弱。

融合内容与方法表面化使得思政元素融入生硬突兀。在初步融合探索中,如何将思政元素自然地融入体育教学,成为一道普遍面临的难题。部分教师因对体育项目的精神内涵挖掘不深、对融合教学设计缺乏系统把握,常采取简单、标签化的融入方式。有的课前几分钟的口号式宣讲,有的在讲解技术动作时生硬嫁接道德说教。这种处理方式,使得思政元素与体育教学内容严重脱节,陷入“油水分离”的尴尬境地。这种生硬的植入非但无法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反而可能引发逆反心理,认为这是对体育课专业性的干扰。真正的体育思政,应当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过程,其内核必须根植于体育精神、体育文化 with 体育活动本身,而非游离于课堂之外的附加品。

评价体系单一固化难以有效衡量体育思政的综合成效。评价是教学最直接的指挥棒。当前,高校体育课程评价体系大多沿用传统模式,以体能测试成绩和运动技能掌握度作为核心评分依据。这种结果导向的量化评价方式,虽能衡量学生的身体健康指标,却难以评估其在体育精神、意志品质、团队协作、规则意识等思政维度的成长成效。体育思政的育人价值具有隐性化、长效性的特点,绝非一次体测、一张成绩单所能涵盖。当评价体系片面聚焦显性的技能与体能指标,教师的教学重心与学生的学习动机便会随之倾斜,体育课程的思政育人目标则被置于次要位置。

高校体育教育与思政教育的有效融合路径

强化价值引领,树立体育教育与思政教育协同育人的共同理念。要根本上扭转融合偏差,首要任务是在理念层面破冰。高校管理者与全体教师必须深刻认识到,立德树人是所有教育工作的中心,体育教育则是实现该目标不可或缺の阵地。学校应通过顶层设计,加强对体育思政的系统规划,并定期组织跨学科的教学研讨与师资培训,帮助体育教师更新教育观念,提升思政素养,明确自身在协同育人格局中的核心角色。同时,也要引导思政课教师走进运动场,共同探索二者融合の切入点。唯有体育教师与思政教师树立起育人目标一体化的共同理念,构建目标同向、行动协同的育人共同体,方能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体教融合、思政育人的深度奠定坚实的思想根基。

深度挖掘体育项目中的思政元素,创新一体化教学方法与载体。实现自然融合的关键,在于对体育项目本身蕴含的思政元素进行系统梳理与深度挖掘。每一个体育项目都是一个丰富的思政教育资源库,教师应围绕这些内生性元素开展一体化的教学设计。在教学方法上,要跳出单纯的技能讲授局限,采用情境教学、案例教学、项目式学习等多元模式。可组织学生探讨经典赛事中运动员的拼搏故事,设置挑战性的团队任务,让学生在合作中体验规则与协作,还可结合体育史阐释体育强国梦与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通过多元化教学载体,让思政教育无痕地融入体育实践的每一个环节。

构建多元化体育思政教学评价体系,兼顾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的有机结合。为确保体育思政的育人目标落到实处,必须改革单一的评价体系,构建一套能够全面反映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的多元评价体系。这一体系应将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有机结合。终结性评价依然保留必要的体能与技能考核,但需适度降低其权重。更为重要的是引入过程性评价,通过课堂观察、行为记录、成长档案等方式,持续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态度、行为与思想变化,如参与积极性、尊师自觉性、体育道德践行度、抗挫坚韧性等维度。此外,还可引入质性评价方法,如指导学生撰写体育精神感悟、参与主题实践报告、进行团队合作反思。

体育思政绝非思想政治教育在体育课基础上的简单叠加,而是旨在回归体育教育育人本真的深刻变革。当前实践中,融合意识不强、方法运用生硬、评价方式单一等问题,印证了这场变革的复杂性 with 艰巨性。要真正实现高校体育教育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必须坚持系统施治。这要求教育者完成三重转变,即在理念层面,筑牢协同育人的思想根基;在实践层面,探索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在评价层面,树立衡量综合成效的科学标尺。 (作者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讲师)

推动高校体育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教学范式变革